

中国共产党历史知识 活动过程论析^{*}

王冠中

[关键词] 党史知识；知识生产；知识积累；知识传播；知识应用

[摘要] 过程思维是认识和理解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论思想指引下，中共党史知识体系是党史知识从“来”到“去”诸过程的集合体。党史知识生产、积累、传播和应用，是这一“过程集合体”中最主要、最常见的四个过程。知识生产重在探讨党史新知从何而来问题；知识积累具体考察党史知识分类、编码和存储诸环节；知识传播深入分析传播方式、传播空间和不同传播内容对传播效果的影响；知识应用则强调在做好知识选择基础上，如何科学、适时促成知识转化。对中共党史知识过程体系的探讨，有利于弥补党史知识结构体系研究的不足，使实践主体对党史知识本体的认识能够更全面、更深刻。

[作者简介] 王冠中，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100875）。

中国共产党历史知识，简称党史知识，是人们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形成的各种观念和认识成果的统称。这些观念和认识成果通常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史实为基本素材，是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全貌的重要精神财富。^①关于党史知识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党史专家胡华就频繁使用过“党的历史的知识”^②和“党史知识”^③等表述。就党史知识价值而言，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号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对包括党史知识在内的各种历史知识的学习，因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项目“习近平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与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建构研究”（项目号：2024JZDZ028）的阶段性成果。

^① 对“党史知识”这一概念内涵的梳理，借鉴了马克思有关知识与意识相互关系的论述，以及《辞海》对知识概念的界定。（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2-213页；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4），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2934页。）

^② 《胡华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56页。

^③ 《胡华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77、579页。

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①。这些学术积累和理论阐述,为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打下了良好基础。

新时代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离不开对“体系”概念内涵的科学把握。当前学界相关成果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基于知识体系由一个个知识单元集合而成这一基本事实,重点探讨了该学科知识体系的内涵特征、框架结构、建构缘由和原则遵循等内容,这是运用系统思维深入研究该学科结构体系及其相互关系的集中体现,其必要性毋庸置疑。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论思想指引下,体系还意味着时间维度内以“过程集合体”形式存在的整体。这一思想认为,世界“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②,特别强调事物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③。“过程集合体”概念表明,事物发展过程并非孤立的、线性的,而是由诸多过程纵横交错形成的复杂过程体系。以过程思维来认识党史知识体系,它是一个关涉党史知识从“来”到“去”诸过程的集合体。党史知识生产、积累、传播和应用,是这一“过程集合体”中最主要、最常见的四个过程。系统梳理这些党史知识活动过程,可为深刻认识党史知识本体、进一步丰富党史知识库存打牢理论基础,也可为将自主理念贯彻落实到具体知识活动过程找到抓手。

一、党史知识生产

党史知识生产,是指生产主体通过社会实践、系统研究和交流协作等方式,对党史史实及相关信息进行加工制作,以更客观地呈现事件、过程及其相互关系,形成新观念、验证或创造党史新认知的过程。在一个完整的党史知识活动过程中,知识生产通常处于前置阶段。了解谁生产、怎样生产和为什么要生产诸问题,是系统分析和把握这一知识活动过程的关键。

首先,系统梳理党史知识生产的“个体”和“群体”。结合党史知识发展历程以及中国实际情况可知,从事中国共产党历史知识创新、创造等生产性活动的主体,通常包括党的领导人、普通党员、党史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和人民群众等。按生产的协作程度进行划分,这些主体又可划分为个体和群体两大类。个体类生产主体如党的领导人、普通党员、专家学者等,他们独立从事生产,为党史知识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向来重视学习党史,客观评价党史人物和重大事件,形成了积极主动生产党史知识的优良传统。如毛泽东,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首次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长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评价,称“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④,并将这一评价写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从政治动员、思想传播和革命火种的延续等维度,科学总结了长征的历史贡献,形成了对长征的新观点和新认知,增添了党史新知识。时至今日,对长征的这一经典概括和精辟总结,仍被党史学界广泛认可,经久不衰。

群体类生产主体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和地方党史研究部门、高等学校、党校、学术团体等机构和组织。这些机构和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常以科研项目、会议研讨等方式开展党史知识生产,出版了许多重大党史研究成果。例如,历次党代会报告对党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历史经验的总结,以及党的历史决议的制定等,都是党史知识生产的重大事件,其主体就是党的中央委员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0、29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150页。

会。在专业科研机构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是当前国内权威的党史知识生产专业机构。此外，各地党史研究部门对地方党史知识的生产，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学术团体和项目组也是以协作方式开展党史知识生产的重要主体。前者如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等，产出了多卷本《中共党史人物传》等重要著作。后者表现最为典型的，是每年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立项的“党史·党建”类科研项目，大多数立项项目都会成立一个项目组，也是近年来党史知识群体性生产的重要路径。以2024年为例，当年公布立项的党史类年度重大项目12项，重点项目12项，一般项目102项，青年项目81项，西部项目16项。与此同时，还有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重大课题、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等重大项目。这些项目，尤其是重大项目（专项），都是以课题组形式开展协作式知识生产的制度化举措。

此外，中国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还有一批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他们也在从事与中共党史相关的知识生产。港澳台地区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等。国外的代表性机构，如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等。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也有相关研究机构。这些主体从事党史知识生产，存在着生产链条完整、意识形态强等特点，配有《中国季刊》等国际知名学术期刊，涌现出如费正清、傅高义等一批知名学者。了解他们的党史知识生产规模、动机等相关内容，会进一步增强我们对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其次，科学划分党史知识生产的个体化和集体化方式。与上述将中共党史知识生产主体划分为个体和群体的二分法相对应，从组织形式来划分党史知识生产方式，主要包括个体化生产和集体化生产两大类。

个体化党史知识生产。诚如知识史学者伯克所言，知识生产就是主体将包含信息的事物通过一步步发现、分析、“制作”或者“加工”，最终转化为知识的过程。^①个体化党史知识生产，是指党史新认知、新观念的形成，通常由单个个体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独立完成。具体而言，以此种方式进行党史知识生产，信息搜集、检索、整理、分析、批判、比较、验证、评估和系统化等生产环节，社会协作程度相对较低。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协作程度低并不意味着其可以脱离社会实践。例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这一指导党史研究的新认知，是张静如在一篇同名文章中系统提出来的。^②但据其回忆，这一新观点的形成，与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去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作学术报告和开展科研著述等科研实践紧密相连。对此，其也如是说道：“这就是我在后来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观点的最早萌芽”^③。

集体化党史知识生产。在此种生产方式中，党史知识生产呈现出主体多元、协作性强和组织程度高等特点。例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之际，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卷，共86万字，是近年党史知识生产的重大成果。这一重大成果是在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完成的，广泛征求了87家中央和国家机关、军队有关部门和单位，以及党史界、理论界相关专家的意见和建议^④，是党史知识协作生产的典范。

① 参见彼得·伯克：《什么是知识史》，章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69页。

② 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③ 张静如：《暮年忆往》，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204页。

④ 新华社：《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负责人就〈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出版答记者问》，《人民日报》2022年6月30日。

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知识丰富和发展的历程看，延安整风运动之前，党史知识以个体化生产为主。整风运动开始之后，1941年9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将原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使其“成为用马列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公开学术机关”^①。中央研究院下设有中国历史研究室，由原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改组而来，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为指导，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历史相关研究。同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又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加强对党史知识生产的领导。此后，党史知识的集体化生产越发受到重视。

最后，深刻把握党史知识生产的动因及特点。不同主体开展党史知识生产，大多为满足各自需求而付诸行动。如国外相关机构和个体，主要为其背后金主和所在国政府决策服务。国内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党史知识生产，主要为满足资政育人、形塑集体记忆、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和传承红色基因血脉等需求。如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党史学习和研讨、编写党史学习资料、撰写党史著作，掀起党史知识生产高潮，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党史知识生产，以新的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来重构党史叙事、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从而实现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

就特点而言，一方面，党史知识生产具有其他领域知识生产的共性，如物质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境中，知识生产，或曰知识创造，与观念生产和意识生产等概念紧密相连^②，事关实践主体认知的重构和新观念的生成。与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和孔狄亚克感觉主义知识生成论思想不同，马克思主义知识生产概念，首先强调其物质性，因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和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③；其次强调其社会性，即认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④，要了解新旧知识（意识）更替的原因和动力，需要从社会关系的变迁中去探寻；最后强调其实践性，认为人的一切知识（包括才能、经验等）都是后天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实践是一切知识生产的基础。另一方面，党史知识生产也有其鲜明的个性和特色。20世纪90年代后期，党史专家张静如在解释中共党史研究为何要单独立“学”的原因时，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特殊性，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涉及的社会层面极广，内容十分丰富，过程特别曲折复杂，不单独立‘学’，不形成一个相当规模的研究体系，无法深入研究”^⑤。党史知识生产的个性和特色，源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这种特殊性。此外，从党史知识与现实的互动关系来看，党史知识生产因其事关历史经验在现实政治的重构，与现实权力结构的嬗递和社会整合目标的实现有机统一，这一现实政治性明显强于其他类别的知识生产。

二、党史知识积累

在探讨知识与真理的关系时，金岳霖提出了“知识总有积累底效果”这一重要命题，强调“知识总是日积月累的”，虽然一定时期内“真理或概念的总结构”暂时得不到，但通过不断的积累，真命

①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328页。

② 马克思认为，“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来说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行动”“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2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1、161页。

⑤ 张静如：《中共党史学诠释》，《北京党史研究》1997年第3期。

题总会被发现。^① 知识积累不仅对传递价值、修正谬误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事关人类知识总量的增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过程和生产关系时，曾使用过“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知识的积累”^② 等表述，来阐述知识积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贡献。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还专门探讨了知识代际积累的重要意义，明确指出“科学则与前一代人遗留的知识量成比例地发展”^③。这些论述和观点表明，经典作家们已经关注到知识积累的社会意义。就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党史知识而言，知识总量的增长，一方面由主体通过上述知识生产得以实现；另一方面，经年累月的积聚，尤其是对前代知识的传承和创新，也是推进党史知识增长的重要路径。考察党史知识的积累过程，应重点关注分类、编码和存储等关键环节。

首先，推进党史知识谱系化。谱系化即对知识进行科学分类，是高效推进知识积累的基础性工程。早在17世纪上半叶，实验科学的创始人培根就明确指出，科学的进步依赖于对自然现象的分类整理，“必须借着那些适用的、排列很好的、也可说是富有生气的‘发现表’，把与探讨主题有关的一切特殊的东西都摆开而排起队来，并使我们的心的就着那些‘发现表’所提供的、经过适当整理和编列的各种补助材料而动作起来”^④。同理，将党史知识按时间、内容、主题、特性、方法或目的进行科学分类，使人们得以快捷检索和存储相关信息，从而为党史知识积累提供一个结构化框架。

从历史实践看，延安整风运动之前，党史知识分类大多按时间和内容展开。整风运动开始后，这一方法得以沿用。如由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编辑印行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史学习材料，以党的六大为时间界点，先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党史材料一分为二，这是按时间进行的分类；材料内部则按正确路线、错误路线进行分类，或是分为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军事问题、锄奸问题、职工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宣传教育等类别^⑤，这是按内容进行的分类。新中国成立后，在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在高校开设党史和革命史课程等多重推力的作用下，以构建党史和革命史知识体系为目标的党史知识分类应运而生。代表性成果如胡华1950年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何干之1954年出版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均以强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革命史叙事、构建适应新形势的党史知识新体系为目标。此外，1951年10月，由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也通过注释和题解等方式，将毛泽东著作按“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专政”等主题进行分类，引领了党史和革命史知识体系的建构。改革开放后，随着学科意识的增强，在推进党史研究科学化和现代化总目标下，党史知识分类走向多元化。如张静如在探讨中国革命史研究对象时，按研究客体在结构上的分层，将党史和革命史知识进行如下分类：最高层级为中国近现代通史，次之为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专史，再次之则为专史下的类别史，由此形成第三、第四层级。党史则属于政治专史下面的政党专史中的中国共产党历史^⑥。这一分类是在明确党史的历史学学科属性前提下展开的。此外，还有研究者提出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⑦、“中心研究区”与“边缘研究区”^⑧等知识分类建议，助推了党史知识的谱系化发展。

① 参见金岳霖：《知识论》（下），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936、9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6-187、18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2页。

④ 培根：《新工具》，许宝骥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8页。

⑤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目录页。

⑥ 张静如：《关于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对象》，《革命史资料》1986年第1期。

⑦ 李君如：《关于加强新世纪党史工作的若干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⑧ 王冠中：《中共历史学复兴阶段的边缘化问题初探》，《北京党史》2003年第3期。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设置,对其学科属性的探讨又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学科知识分类问题。相关探讨应抛开原有“政治学”“历史学”,抑或“政治性较强的历史学”之类的思维惯式,在新学科建制中探寻党史知识的科学分类,为推进党史知识高效积累打下坚实基础。

其次,掌握党史知识编码形式。与分类强调党史知识的组织逻辑和层级谱系不同,编码则重点凸显党史知识的表达形式,即通过语言文字、数字、代码等符号系统,将党史知识转化为便于存储、传递和处理的符号化、结构化展现形式。文本叙事、空间结构和电子数据,是需要重点把握的党史知识编码形式。

文本叙事编码。这种知识编码形式,常见于党史研究范式的探讨中。如学界以所谓革命史范式对中国近代史展开研究,革命史范式将相关知识编码为“一根主线”(以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为主线)、“两个过程”(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八大事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由此形成一个稳固的叙事框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产生了较大影响。除革命史范式外,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现代化范式、社会史范式、“新革命史”范式等,都反映出学界对党史和革命史知识进行编码的新尝试。

空间结构编码。将载有党史信息的遗迹、实物遗存、档案等分散的党史知识载体,按特定空间结构进行重新编排,形成一种可视化或沉浸式的叙事空间,也是推进党史知识积累的重要环节。对党史知识的这类编码,主要体现在相关博物馆、展览馆和纪念馆的展陈上。如2021年7月面向公众开放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首展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按“建立中国共产党 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行改革开放 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时间顺序,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分为4个部分,通过26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第一次全方位、全过程、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史诗般的历史。除展览馆外,全国各地还有大量的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和陈列馆等,都以空间结构编码形式实现了党史知识积累。根据国家文物局的专项调查,2021年全国革命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展览馆共计1644家,2023年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23家。^①此外,各地绘制的红色地图、红色文化带、“红色基因图谱”等,都属于这类知识编码形式。

电子数据编码。利用VR/AR、3D建模、时空数据库等技术,将党史信息电子化,融声光电于一体,在互联网中创造出展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网络虚拟空间,是信息时代党史知识编码的新路径。这方面的个案,如北京香山革命纪念馆的AR导览、红军长征VR体验、“数字长征”、各地试行的智慧化党史展览馆和元宇宙党史数字展厅等。这一党史知识编码的新形式,将抽象化党史知识转化为具象化可感知的空间符号,通过创设数字空间和提供交互式体验,以此实现党史知识积累。

最后,了解党史知识存储介质和存储方式。如何将既有知识以系统化、结构化方式,保存到纸张、胶片、人脑、电子存储器等特定介质中,使其可以被重复检索、利用和传承,直接关系到知识积累“量”和“质”的提升。从存储介质的演化来看,中国知识存储方式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原始社会的口耳相传、结绳记事,奴隶社会的甲骨金石、竹简帛书,到东汉之后纸张的大量应用,再到近代以来胶片和数字存储器的发明等演化阶段。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知识存储仍以大脑、纸张等介质为主。

进入21世纪之后,党史知识存储正在经历由传统介质向数字化介质的转型。一方面,以纸张、

^① 参见刘善庆主编:《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3页。

微缩胶片等为代表的传统知识存储介质，在当前的党史知识存储和积累中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图书馆、档案馆等制度化知识存储机构和组织，仍是我们查找党史信息、从事党史知识生产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电脑、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以磁介质（如HDD、磁带）、半导体介质（如SSD、U盘、闪存卡）、光学存储介质（如蓝光光盘）和云存储为代表的数字介质，在党史知识存储中的使用频率快速提升。由于知识存储方式的数字化和电子化，可以将原来由纸张存储的信息数据化，这些数据可以通过互联网快速流动，并在不同的新情境下被赋予新意涵，由此加速了党史知识的迭代更新，促使党史知识和信息形成大数据流。这些大数据流在挑战传统党史研究思维方式和叙事方式^①的同时，还会进一步推进党史知识存储向数智化、生物存储和量子存储方向演进，以此促进党史知识积累提质增效。党史学科应利用好这一转型机遇，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提前布局，下好先手棋。

由上述分类、编码和存储诸环节可知，党史知识积累在增加党史知识总量的同时，还具有推进党史知识体系化的功能。党史知识体系化，内嵌于党史知识积累过程之中。谱系化分类为党史知识的体系化提供结构化框架，知识编码为知识体系化提供科学的表达形式，知识存储则为知识体系化提供基本素材保障，三者有机统一于党史知识积累活动之中。

三、党史知识传播

生产或积累起来的知识，大多会通过一定方式和渠道脱离其原生状态，在不同时空和不同主体间流转传递，并被其共享、吸收，这便是知识的传播。诚如伯克所述，知识传播主要用于对抗“知识分散”、破解知识分布不均和“信息茧”等困境。^②就党史知识传播而言，它还肩负着通过知识共享形成集体认同、传承红色基因血脉、降低社会协作成本和创造新价值等使命。优化党史知识传播，当前需重点把握如下关键环节。

首先，推进传播方式新旧融合。传播方式和手段的科学运用，是提高知识传播效率的关键。当前，党史知识传播与人类社会其他类别的知识传播一样，正经历着由传统媒体向数字化新媒体的转型。一方面，以书籍、报刊、海报、宣传画、电视、广播等为代表的老式传播媒介，在中共党史知识传播中仍然举足轻重。以纸质介质为载体进行党史知识传播的代表性著作，如《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二、三卷）等，报刊如《人民日报》《求是》等，至今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信息技术推动下，各类党史知识专题网站、手机APP、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网络微党课、慕课平台、党史数据库等如雨后春笋，对传播党史知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展望未来，随着ChatGPT、DeepSeek、量子通讯和生物存储等技术的革新和应用，党史知识传播将会迎来从信息传递向以智能神经突触连接为代表的意念传播的迭代。面对知识传播方式手段的新旧更替，我们既要发挥好传统媒体和传播方式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述，“注重发挥互联网等现代传媒在人们工作和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加大党史宣传教育和党史知识普及力度”^③，打造聚传统方式和新方式于一体，便于资源共享、内容互补、格式兼融的党史知识传播新生态。

其次，促成传播空间内外联动。从空间上看，党史知识传播有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之分。国内传

① 王冠中：《大数据时代的中共党史研究：挑战与变革》，《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6年第3期。

② 参见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下卷，汪一帆、赵博函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7页。

③ 董宏君等：《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0年7月22日。

播的制度化举措,包括学校教育、主管机构宣传和理论阐释、相关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的展陈等,非制度化举措包括党史题材的文艺展演、专家学者的学术报告和会议、自媒体传播等。针对知识受众的群体性特征,不断改进传播方式,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提升传播效率。

与此同时,还需大力加强党史知识国际传播。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党史专家胡华就认识到,随着“中国共产党声望日益增高”,以及世界上研究中国史的重点,“已经逐步从研究中国古代史转向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当代研究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已经成为世界上历史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所以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便成为“我国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工作者应注意和重视的一个方面”。^①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强,以及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大踏步提高,加强党史研究的中外学术交流、推进党史知识国际传播尤其紧迫。中共中央宣传机构和党史工作主管部门可从课题规划、会议研讨等方面入手,加强党史知识传播的顶层设计,大力增强传播能力建设,通过内外联动打造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链,牢牢掌握党史知识传播的主导权。

最后,实现传播内容显隐互促。从传播方式和可编码性等方面进行考察,知识有显性和隐性之分。显性知识可通过书面文字或数字化媒介直接传播,而隐性知识则主要通过师徒制耳濡目染或实践中“干中学”间接传递。显性知识传播的重要性,如前文所述,不再赘述。对于隐性知识,有研究者从“我们永远不能说出所有我们知道的一切”这一命题出发,强调“我们的所有知识在根本上都具有隐性”^②。这一观点,阐明了隐性知识存在的认识论根源。

党史知识实际上也存在这种“隐性”部分。一方面,由于党史知识生产需要贯彻党性与科学性、政治性与学术性相统一的原则,在一定时代条件下不宜细抠细说的史实,诚如邓小平所述,要“宜粗不宜细”^③。这种被“粗线条”遮盖起来的部分,就属于党史知识的隐性部分。对于这类知识,党史工作者要有一个通盘考量,即“什么问题可以讲,什么问题暂时不能讲,要有步骤,有一个过程;……历史不能篡改,但有些问题暂时可以回避”^④。待时机成熟时,对增强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生命力和战斗力有帮助时,可再行研究。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党史研究生专业人才培养,仍实行导师制这种师傅带徒弟的制度化模式,导师在研究领域、学术专长和治学风格等方面形成的隐性知识和经验,通过潜移默化方式传递到下一代,由此形成党史界不同学术共同体的治学特色和学术风格,这是党史知识隐性传播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党史知识传播中,要深刻把握影响不同类型知识传播的关键因素和作用机制,做到显隐互促、统筹规划、整体推进。

四、党史知识应用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知识应用与劳动及社会实践紧密相连。马克思在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生产过程时指出:“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⑤。恩格斯也强调:“并非任何劳动都只是人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许多种类的劳动包含着

① 胡华、林代昭:《台港和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1期。

② 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朝向后批判哲学》,徐陶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1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7页。

④ 《胡华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3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4页。

需要耗费或多或少的辛劳、时间和金钱去获得的技巧和知识的运用。”^① 党史知识应用，就是实践主体将已获得的知识，通过特定方法转化为政策方案或具体行动，以实现问题解决、决策优化或新价值创造的过程。新时代党史知识的应用，需重点把握如下关键环节。

首先，明确应用场域。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阐述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时，就特别提醒全党同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② 同理，党史知识应用，也需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明确知识应用的具体场域和历史条件，根据现实需求确立应用目标，弄清“要干什么”，这是科学运用党史知识的前提。具体而言，党史知识通常具有保存历史记忆、开展资政镜鉴、践行育人担当和增强集体认同等功能，明确应用场域，就是要根据不同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国家发展或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具体需求，分场域、分类别发挥党史知识的相应功能。

其次，做好知识选择。明确应用场域、确定行动目标后，主体便需要在既有党史知识库中选定符合要求的知识。要做好此项工作，一方面要科学开展知识检索，在前文所述分类、编码和存储基础上检索和选择要使用的党史知识，是一项极度考验主体信息技术素养的工作。素养高、方法得当，从海量结构化或非结构化党史知识资源中提取到有用信息的精准度也就越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和互联网的发展，党史知识检索已进入到网络数据库时代，原有按书目索引卡片进行检索的传统方式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新兴的网络数据库检索方法，既包括在文本库检索中常用的布尔算法、向量空间模型和概率模型，也包括以潜在语义分析、语义解析和知识图谱嵌入为代表的语义增强检索方法。虽然当前党史知识检索仍以确定关键词和编辑布尔算法为主，但随着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这方面检索将会迎来从简单字符串匹配向融合符号逻辑、统计学习和神经推理于一体的智能系统转型，这是党史知识应用需要关注的前沿领域。另一方面，党史知识选择还包括知识整合工作。即是将分散、异构的党史知识单元按照应用主体目标进行关联、重组和优化，以解决所选知识与所要解决问题的适切匹配问题。如每次党代会报告的起草，既有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 and 政法委等各职能部门分头把关，也有国务院和全国人大系统的负责，同时还有多学科专家、多方面智库参与，是一个典型的知识整合过程。党史知识选择和应用，同样也包括此项内容。

再次，促成知识转化。党史知识要发挥其应有功能，就必须将其转化为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决策优化，转化为党自我革命的经验和本领，转化为主体的实践智慧和能力。例如，在重大党代会前夕，以制定历史决议形式实现全党空前团结和思想统一，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促成党史知识转化的经典案例。毛泽东是善用党史知识的高手和大师，在抗战胜利前夜，他亲自主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经反复讨论和修改后，最终在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获原则通过。这个决议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作出详细结论，“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致，增强了全党团结”^③，为随后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凝聚全党力量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又主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科学评价，并在1981年党的十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③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届六中全会上获得一致通过。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述,它“分清了是非,纠正了‘左’右两方面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思想,对推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更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①,也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同样,由习近平总书记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获得一致通过,“对推动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②,为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三个历史决议的制定和实施,为我们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将党史知识转化为实践伟力的生动画卷。

最后,注重监测反馈。从人类运用知识的实践看,知识时常存在被误用的情况。造成知识被误用的原因,大抵包括两种情境:一种是主体在一定时代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受知识水平、认知能力和行为偏差等方面因素影响,如甄选知识不当、知识传播中存在信息丢失,或受个体不良情绪作用等造成的误用,这种知识误用基本上属于主观无意的结果;另一种是在利益作用下形成的有意“误用”,反映了特定权力结构中行为主体的特定利益诉求。无论是哪种情况的误用,都凸显出加强党史知识监测反馈的重要性。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就特别重视对党史知识应用的监测反馈。针对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以诽谤毛泽东、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为主要目的的“非毛化”思潮,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正面回击;另一方面,通过成立党史工作领导机构和编研机构,对党史知识应用实施专业化监管。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央党史委员会,在中央书记处下直接设党史工作小组,1988年又将党史工作小组改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作为主管全国党史工作的领导机构。此外,1980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式成立,同年又将原“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改组为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管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相关文献的编撰等党史知识生产和应用工作。新时代以来,防止党史知识误用的工作重点,就是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揭露历史虚无主义打着研究党史旗号对党史知识进行蓄意“误用”的伎俩,确保党史知识应用行进在正确轨道上。

结 语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论思想为指引,系统梳理党史知识活动从生产、积累、传播到应用的动态过程,其学术价值至少包括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新思路。如前文所述,当以过程思维考察不同党史知识活动过程、审视党史知识体系时,知识在主体思维中便实现了由静到动、从“死”到“活”的跃升。相较于“死”知识,“活”知识一个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它能为新知识生产建构必备背景,创造不可或缺的条件。尤其是在人脑“联想”功能和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作用下,它会加快党史新知识的生产速度。例如,中共一大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有关年龄、籍贯、民族、国籍等方面的数据,在纸版介质时代,其作用往往局限于记录这些代表的个人信息。通过电子化处理能在互联网上流动之后,它不仅能为撰写党的创建史提供资料,更重要的是,通过数据库关联,它还可以为当时党的群众动员、革命政策制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新知识的生产创设背景。了解生产主体、生产方式等关系党史知识来源的内容,就可以更好地掌控其生产过

^{①②}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程,从而为推动党史知识高质量生产、丰富党史知识既有库存奠定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为贯彻落实自主价值理念找到抓手。自主价值理念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原则。近年来,有观点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仅存在于中国,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的中共党史党建学本身就是本土的、自主的,所以这个学科与其他学科不一样,其知识体系构建不存在是否自主问题。这一观点明显混淆了知识生产主、客体的关系,是对党史知识生产过程缺乏了解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的自主性和本土性特色,并不必然会带来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理由很简单,因为以中国共产党为客体开展知识生产的主体,并不仅仅存在于国内。这类知识生产主体在国外也有很多,他们不仅形成了各种学术团体和学术派别,且一定时期内还赢得了党史知识生产和传播某种程度的话语权。从海外一些知识生产主体搞所谓“告别革命”等知识“误用”的事实可知,贯彻落实自主价值理念,应贯穿党史知识活动从生产、积累、传播到应用诸过程始终。

综上所述,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在深入探讨从局部到整体结构体系的同时,也需关注从生产、积累、传播到应用的过程体系;在运用系统思维的同时,也需发挥过程思维的作用。唯有以多元开放、兼容并蓄态度构建的自主知识体系,才会更加健康、更有生命力。

[责任编辑 王赞鹏]

An Analytical Discussion on the Activity Process of Knowledge of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ng Guanzhong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Key words**] knowledge of Party history; knowledge production; knowledge accumulation;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knowledge application

[**Abstract**] Process thinking is an indispensable dimension for understanding and comprehending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and Party buil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uided by the process theory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Party history is an aggregation of processes from the “produc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of Party history. The production, accumulation, disse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constitute the most critical and prevalent four processes within this “aggregation of processes”. Knowledge production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production of new insights into Party history; knowledge accumulation involves examining the classification, coding, and storage of knowledge of Party history;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delves into the impact of dissemination methods, spaces, and varying conten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dissemination; knowledge application emphasizes how, based on well-informed knowledge selection, knowledge can be scientifically and timely transformed into practical use. Exploring the process system of knowledge of Party history helps address the gaps in the existing scholarship on the structural system of knowledge of Party history, enabling practitioners and researchers to develop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ontology of knowledge of Party history.